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研究中共農村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教育的面相來理解中共根據地經營的過程與面對的問題。

有關中共農村工作的情形已有許多相關研究，一般而言，中共的農村工作始於改造農村結構，建立農村據點，包括派遣幹部調查農村狀況、宣傳並建立農民組織，發動群眾大會打擊惡霸地主，進行土地改革或是減租減息，然後進行鄉選，建立新的農村領導階層。這是一個農村社會、政治、經濟的利益重分配過程，也是中共開發與鞏固新據點的過程，重新分配的獲益者，包括新幹部和大部分農民將是中共的穩固支持力量。

然而，對戰時的中共而言，建立了農村據點只是農村工作的開始，接下來有兩項工作才是更重要的：一是對農村現有資源作充分的動員和利用；二是進一步開發農村中新的人力資源。在進行這些工作的過程中農村幹部將會面臨許多的問題：

首先是要使農民有配合政策的意願，使中共能充分動員農村資源又不引起農民的反彈。在戰爭持續進行的狀況之下，中共控制之下的農村有著相當沉重的負擔：要繳救國公糧，要抽丁入伍，要參加自衛軍勤務，要義務勞動修橋補路，要優待抗日人員家屬、政府工作人員家屬、陣亡烈士家屬，要組運輸隊支援前線，要組擔架隊清理戰場，甚至要積極響應救國公債的推銷。共產黨的到來最初當然帶來了許多好處，但隨著賦役逐年加重，農民的不滿也日漸高漲，中共要如何讓農民了解這些工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化解農民的不滿，鼓舞沉重負擔之下的民心士氣？

其次是要讓農村中現有的人力具備有執行中共各項工作的能力和觀念。各項工作的推行需要農民的配合，但是農民文化水準的低落，文盲率高，加上傳統社會中長期所累積下來的「封建思想」、迷信、錯誤的衛生觀念、落

後的自然常識和生產知識都可能阻礙了農民的配合執行政策的能力和意願，要如何使農民具備做為一個中共政權公民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

最後是如何進一步作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中共不斷的發展，需要派遣大量人員到根據地以外地區作戰或工作，根據地內的各項工作需要幹部領導和所有可用人力的配合，人力資源一直是處於緊張的狀態，因此開發新的可用人力是一件重要工作。開發人力資源可分為兩部分，一是提昇現有的人力素質，以期能擔負更重要的工作；二是開發新的人力資源，目標放在未加入生產的成年男子(如二流子)，及傳統社會中不在動員之列的婦女和兒童。如何使這些人的觀念和能力成為可用資源？

由於陝甘寧邊區的特殊條件，農村中的動員工作可能遇到更多的困難。塞爾頓(Mark Selden) 曾經提出陝甘寧邊區相較於中共其它根據地的幾個特點：一、它是中共所有根據地中最貧窮的地區；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之前便已大部分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工作；三、在一九四七年以前一直是中共未受戰火直接衝擊的大後方；四、一九三五年底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是中共中央所在。¹所有這些條件結合使得陝甘寧邊區的農村工作存在著一些嚴重矛盾：一方面，中共中央所在地意味著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意志貫徹最直接的地方，而位處大後方也就成為各方面動員最徹底、負擔最沉重的地區。另一方面，位處大後方卻代表著居民先天上對於戰爭的敵我意識較為薄弱；土地改革大部分已完成，代表共產黨所可能帶來的最大利益早已「利多出盡」；而貧窮則代表邊區居民對於動員的容忍力較低，人力素質提升困難。簡言之，陝甘寧邊區先天所具有的條件不佳，但卻必須承受更多的負擔。

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許多方面來著手，但對於以模範民主根據地為標榜的陝甘寧邊區而言，激烈的手段已不再適用，因此廣泛而長期的教育措施便成為溫和而有效的可能方法。教育的形式有很多，地方幹部的領導和宣傳、定期或不定期召開的群眾大會、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都是可行的方式，報刊、

¹Mark Selden, "Yan'an Communism Reconsidered," *China Quarterly*, Vol.21, No.1,(Jan.1995,) , pp.9-10.

海報、漫畫、戲劇表演也可以收到一定的教育效果，但是農村中長期固定的常態性教育活動顯然應該會有更大的影響和效果，這也是本論文最主要的研究動機。由過去學者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中共對於農村中常態性的教育工作一直給予相當多的關注；從中共因農村教育問題所作出的多次政策修正，官方發表的許多談話和文件中可以看得出來，中共眼中的農村教育有其重要地位。然而，這些教育實際推行的情形和成果究竟如何呢？過去學者的研究已經對這個議題有了概略的理解，但筆者認為仍有許多討論的空間。

二、研究回顧

一般而言，學者們對中共教育的研究多數將焦點集中在建國以後，對於中共根據地教育有深入研究的學者相對而言較少。在這些為數不多的著作中以外國學者的研究較為客觀深入，台灣和大陸方面的研究成果則較為貧乏。

在台灣方面，汪學文是台灣少數對中共教育史作有系統研究的學者之一，《中共延安時期教育之研究》是目前僅見中共根據地教育研究的專著，其論點和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本書主要是運用薈蘆²收藏的材料對中共這時期教育做一全面的介紹，對於幹部的高等教育有較詳細介紹，至於其它方面的教育，可能因為材料的不足，只能做整體性的概況介紹。汪氏的結論中以中共內部的報告對於這一時期的群眾教育做出幾點的評價：一、當時課程與當地人民生活脫節，不合需要，加上影響生產活動，不受人民歡迎；二、各方條件不足，因此邊區的教育效果極差，未收到預期的成果。³

汪學文的著作成文於一九七一年，自此之後不再有中共根據地教育的研究專著，即使是小篇幅之期刊論文亦難得一見，葉飛鴻關於中共根據地成人教育冬學運動的研究是唯一可見的文章。⁴ 葉氏的研究以《解放日報》為主

² 現稱法務部調查局大陸研究資料室。

³ 汪學文，〈延安時期的初等教育〉，《中共延安時期教育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問題研究班研究論文，1972年6月），頁6。

⁴ 葉飛鴻，〈抗戰時期中共邊區的冬學運動—以陝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晉冀魯豫邊區為

要材料來源，相較於汪氏對中共群眾教育的負面評價，葉氏對於冬學的評價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冬學是中共在邊區最重要的社會教育組織，對於邊區文化水準、政治意識和動員工作的提升和推展具有普遍的影響。雖然葉氏認為中共的冬學過於著重政治訓練，但是他認為中共的冬學不僅內容符合群眾的需要，形式上也能配合當地農民的生活，推行結果獲得了相當大的成效。

5

汪、葉二人研究所得的結論南轅北轍，但兩人的結論都有可議之處。汪氏的研究由於成文時間較早，受到當時政治和學術環境的影響，文中充滿著預設的批判立場，其結論似有偏頗。葉氏的研究免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干擾，但使用的材料卻有問題。葉氏的研究以《解放日報》的報導為主要材料，《解放日報》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創刊時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一九四二年九月起又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報，⁶引用報導內容若未加以檢驗極可能受到中共官方片面說法的誤導，但葉氏的文章中並未對所用材料的可靠性深入分析，也未參照其它材料來源，研究成果是否客觀值得懷疑。綜觀台灣地區對中共根據地群眾教育的研究，受限於資料的不足，研究數量少而且無法深入，汪學文和葉飛鴻的研究都只能對整個陝甘寧邊區的群眾教育做一般性的介紹，無法做更精細的探究。

大陸學者在這一方面的專著較多，使用的材料也較豐富。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由董純才領銜主編，集十餘人共同編寫的《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⁷ 本書是中共「七五」國家重點教育科研項目之一，為此徵集了上億字的資料，編印各革命根據地教育資料選編，並公開出版了《老解放區教育資料》及《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記事》二書，⁸ 可說是中共教育史研究的一大盛事。由於有廣泛而豐富的材料為基礎，本書有如百科全書一般的將不同性

例》，《國史館館刊》，復刊第十八期，1995年6月，頁165-186。

⁵ 同上，頁185-186。

⁶ 賴伯年主編，《陝甘寧邊區的圖書館事業》（西安：西安出版社，1998年），頁230。

⁷ 董純才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1-3卷（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1-1993年）。

⁸ 同上，「出版說明」，頁1。

質教育和不同地區的教育發展分門別類，不厭其煩的一一列舉說明。相較於台灣方面的研究，本書對邊區教育提供了較全面的理解和較多的細節描述，然而內容過分的割裂使全書無法呈現出統整的論述主軸，加上著者群秉持一貫的官方觀點，所提供的多是表面的正向敘述，缺乏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因此仍然只能從中得到中共根據地教育的概略情形。

經過整理後可以看出本書將陝甘寧邊區群眾教育發展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秋，這一時期的教育由於抗戰時期的形勢影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改變了過去土地革命時期激烈的階級意識教育內容；爲了因應戰時環境，教育內容以配合戰爭需求爲主；邊區落後的人文條件，加上中共教育與舊制度的不同，此時的邊區教育等於是從頭開始，一方面改革舊有教育，一方面也開始大規模的發展各類教育活動，學校和學生數量的大幅成長是這一階段最大的成果。第二階段從一九三九年秋冬至一九四二年，這一時期的重要工作重點和成就是推動各種教育的「正規化」，以提升教育的質量。前一階段的發展雖然在數量上有大幅的成長，但是學校條件、家庭生活及教師水平太差，教育品質低落，「正規化」的用意在於使學校運作制度化，以維持一定的教育品質。此外爲了進一步在數量上有所提升，這一階段也推動了小學強迫入學的義務教育，強制要求學齡兒童入學。第三階段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七年，在整風運動的影響下，這時期針對過去教育工作的缺失做出檢討和改進，檢討認爲過去邊區的教育成果不彰，原因是缺乏「群眾觀點」，無論是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或是教學時間都未考慮到群眾的需要和意願教育教材與生活脫節無法引起人民的學習熱情；「正規化」以提升質量爲口號，但後來變成重質不重量的偏向發展，許多無法達到標準的學校遭到裁併，反而使得推動教育更加困難；加上未考慮現實條件實施強迫入學的義務教育，強迫命令的作風造成許多不滿。針對以上的缺失，一九四四年以後依照「群眾路線」的方針提出了「民辦公助」的新政策，並且得到良好的效果。所謂「民辦公助」是由群眾自辦學校，而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協助和領導，群眾可以根據自身條件和需要來決定學校的形式和運作，課程、教材、教學方式和上課時間不拘一格，經費、教師也由群眾自行決定，其好

處是使教育活動能配合群眾的生活方式和需要，使得群眾上學和辦學的意願增加，促成邊區教育的蓬勃氣象。第四階段由一九四七年至內戰結束，這一時期由於戰爭的影響，加上中共恢復激烈的土地改革，正常的教育活動受到很大影響，一九四九年以後陝甘寧邊區雖然已經遠離戰火，但教育活動恢復緩慢，未見到積極的發展。

《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一書中對於陝甘寧邊區教育所做的論述和評價可說是大陸學界的一致看法，其它相關的論著在細節上略有補充，但內容和結論都大致相同。⁹綜觀大陸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優點在於掌握了較完整的材料，但缺點是受限於既定觀點，鋪陳架構、內容和結論千篇一律，對於事件演變的箇中原委也大多一語帶過，語焉不詳，無法對這段歷史提供較深入的理解。

西方學者對於這個議題有著較深入的分析。西方最早的中共根據地教育研究可能是林邁可(Michael Lindsay)在一九四八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作的一篇報告。¹⁰ 林氏曾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於晉察冀邊區和陝甘寧邊區擔任中共技術顧問，¹¹期間搜集了中共在晉察冀邊區教育法規，再輔以《東北日報》和《解放日報》的報導內容對中共根據地的教育做了初步的研究。這篇報告主要是在討論中共根據地推行教育所遇到的困難，林氏認為中共根據地教育有著人力和物質上的雙重困難，但這些困難對於需要專門師資和大量圖書設備的中、高等教育的影響較大，對於群眾教育¹²的影響則較小，因為群眾教育所需要的師資在中共積極的培訓下，一九四四

⁹其它的著作參閱陳元暉主編的《老解放區教育簡史》(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1981年), 閻樹聲等編著的《毛澤東與延安教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王鐵的《中國教育方針的研究—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1982年)等書。

¹⁰Michael Lindsay, *Notes on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China, 1941-47*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0), pp.1-50.

¹¹林邁可(Michael Lindsay), 《和平共存?》(台北:台灣聯合書局, 1961年), 頁6。

¹²Lindsay 在此處所用的名詞為 Elementary Education, 按字面翻譯應為「初等教育」, 但實際上 Lindsay 所指的是兒童與成人的基礎教育, 亦即本文所謂的「群眾教育」。見 Michael Lindsay, *Notes on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China, 1941-47*, p.49。

年以後便已經可以滿足需求，而群眾教育所需的簡單文具和設備可以因陋就簡，對於教學的影響不大。在林氏的眼中，中共根據地群眾教育的最大問題在於政策方針的錯誤，但這個錯誤在一九四四年「民辦公助」政策之後便已得到解決。林氏認為中共在一九四四年以前所推行的教育制度和政策與國民黨統治區極為相似，都是以西方先進國家的教育制度為藍本，但這一套做法既不適於戰時的中國環境，也不受民眾的歡迎。西方國家的文化教育已有基礎，成人文盲率低，因此重視兒童教育多於成人教育；又由於人民經濟條件較佳，兒童不需負擔家庭經濟生產，因此可以實施全時的義務教育，教育內容也是以未來升學或社會生活需要為重點。在戰時條件下推行這一套教育制度顯然不切實際，因為戰時環境需要的是立即可用的人力和知識，兒童教育緩不濟急，而正規的全時教育則使缺乏勞動力農村負擔更重。「民辦公助」政策出現意在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將群眾教育的重心由兒童轉向成人，教育內容重心由文化教育轉為政治教育；一方面則是將教育活動的推行交由地方主導，根據地方自身條件來決定辦學的方式和內容，以符合民眾需要。林氏對於「民辦公助」政策有高度評價，由外國記者在中共根據地的經驗來判斷，他認為中共在政治教育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在文化教育方面，雖然沒有可靠的數據，但林氏仍然認為識字率有相當大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這一政策獲得民眾的歡迎，尤其在農村地區的推行相當成功。

林邁可的研究嚴格來說只是一篇簡短的調查報告，但報告中對於中共根據地教育的高度評價卻是日後西方多數學者的共同觀點。塞爾頓(Mark Selden)在描述所謂的「延安模式」(The Yanan Way)時對於「民辦公助」作了一番評論。他認為中共一九四二年以前的教育從來未深入過邊區廣大的偏遠農村地區，教育活動只限於一些分區的中心市鎮中的少數人，與農村民眾的生活無關，「民辦公助」的實施將教育真正的帶入廣大的農村生活之中，適合多數邊區人民的需要，比過去的教育的方式發揮更大的效果。¹³

與塞爾頓同時的 Peter J. Seybolt 對於中共根據地教育有較全面的研究，

¹³Mark Selden,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67-274.

他將「正規化」到「民辦公助」之間的轉變視為中共黨內路線之爭的過程，也是日後教育政策上「兩個路線鬥爭」的先聲。Seybolt 認為「正規化」是由一些出身城市知識分子的教育決策單位所推動的，這些人與邊區特殊的環境有所隔閡，將城市中引自西方國家的一套作法硬加在人文條件落後邊區之中。一九三七年開始的教育發展一直效果不彰，當時教育當局認為問題在於缺乏統一的規章制度作為學校運作的依據，因此表面上看來蓬勃發展的教育其實一直是毫無章法的「游擊作風」，因此解決之道在於制訂標準規程作為學校運作的依據，並且依據這一套制度加強對學校運作的控管，以期保證教育政策的確實推行。Seybolt 引用當時中共黨內的批評指出，效果不彰的原因在於教育內容太過於偏重政治教育，與一般百姓的生活無關，無法引起邊區居民的興趣，尤其是愛國教育對於位處戰線後方、缺乏敵我意識的陝甘寧邊區居民而言更是難以引起共鳴。教育不受歡迎，但教育單位又要加強控管，結果便是命令與強迫，引起更多的不滿。此外，多數農村地區學校的條件不佳，難以達到規定標準，教育當局的作法是將這些不合規定的學校取消，最後使得「正規化」變成以城鎮居民為主要對象的「精英主義」教育措施。Seybolt 認為一九四四年以後「民辦公助」方針是以「平衡發展」的教育政策來取代「精英主義」教育政策，教育的重心轉向農村的群眾，並且賦予地方教育更多的彈性。與林邁可看法相反的是，Seybolt 認為這個時期教育的成功在於減少了政治教育，而以生產知識和衛生常識等多數人的實際需要為教育重點，因此得到群眾的支持並獲得良好的成果。¹⁴

Suzanne Pepper 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著作中以較為寬廣的視野和更多材料的支持對於邊區教育的歷史重新做了一次檢視。¹⁵ Seybolt 對邊區教育的分析侷限在邊區歷史的範圍之中，但 Suzanne Pepper 則將這一段歷史放在整個中國現代教育史中來觀察。Pepper 認為民國以來所有教育政策的推行都犯

¹⁴Peter J. Seybolt, "The Yen'an Revolution in Mass Education," *China Quarterly*, No. 48(Oct.-Dec. 1971), pp. 641-669.

¹⁵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18-154.

了重質不重量的共同錯誤。由於環境條件限制，想以西方的標準在中國推動廣泛的群眾教育實際上是力有未逮，因此這些教育推動者在「質」的情結之下，傾向於犧牲「量」的發展來推動教育。Pepper 認為「正規化」的推動是這一套西方教育理念在中共根據地所進行的另一次實驗，而實驗的結果同樣以失敗收場，不同的是，中共很快的從這一場失敗的實驗中得到啓示並且迅速改變政策方向，使得邊區的教育有了大幅的進展。Pepper 認為「民辦公助」政策的成功，除了林邁可曾提到的務實態度外，馬列主義者特有的政治意志力和邊區政府力量的強力後盾都是民國以來所有教育計畫推行所欠缺的重要因素。

在 Pepper 眼中，「民辦公助」是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其意義在走出長久以來對於西方經驗的迷思，建立了一套真正適合中國農村環境的教育體制。在這個重要的轉折點上，Pepper 認為毛澤東居於關鍵的地位。Seybolt 的文章中雖然在論及文化大革命「兩個路線鬥爭」時以毛澤東為「平衡發展」教育政策的代表，而以劉少奇等「修正主義者」為「精英主義」教育政策的代表，但對於毛在一九四三年前後教育政策的轉折中所扮演角色並未加以討論。¹⁶ Pepper 認為，雖然一九四三年前後教育方針轉折的過程中並沒有毛參與決策的直接證據，但由毛澤東自江西時期以來與國際派的衝突中所突顯的務實性格，加上整風運動與教育方針轉變之間的關聯，Pepper 認為毛澤東應是主導教育政策改變的重要人物。

較諸先前的研究，Pepper 掌握了較多的材料，也因此對這一段歷史提供了較多的細節，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對於「民辦公助」實施情形的描述。Pepper 雖然對於「民辦公助」依然有著高度評價，但是他也指出一些過去學者未曾提及的問題。Pepper 根據江隆基在一九四七年的所做的報告指出，¹⁷由於民

¹⁶Seybolt 曾經提到「正規化」推行期間，教育決策單位似乎不太受當時的黨中央及邊區政府的掌握，政策的推行完全不顧邊區政府和地方的反應，似乎認為「正規化」與當時黨政最高領導階層的決策無關。但是 Seybolt 並未對此一說法提出清楚的說明，其真正的意義和真實性並不清楚。Peter J. Seybolt, "The Yen'an Revolution in Mass Education," *China Quarterly*, p. 651.

¹⁷江隆基在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間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副廳長。Pepper

辦學校經費由地方自行籌措，增加了民眾的經濟負擔，並不見得受到歡迎，許多地方甚至要求回歸公辦。在這種情形之下，地方幹部一方面被要求推行政府的「民辦」政策，但一方面又被要求配合民眾的意願，兩者之間相互衝突時，地方幹部的角色十分尷尬難為，有人為了推行政策而對民眾強迫命令，有人則為迎合民眾意願而放任「民辦」學校自流，產生了不少的問題。在「民辦公助」的成效評估上，Pepper 認為一九四四年底實施之初的確獲得了相當大的成果，但隨著國共內戰情勢日益緊張，教育活動的進行也受到了影響，一九四七年實際上已經停頓，因此並未取得顯著的成果。雖然有這些問題存在，Pepper 依然認為「民辦公助」大致上來說受到群眾歡迎，效果也比過去的教育方式好。她採用江隆基的說法認為，民眾支持民辦學校與否的關鍵在於教師的品質，通常如果教師建立了良好的地位，群眾便能接受「民辦公助」，願意自行負擔經費開支。至於在成效方面，Pepper 認為「民辦公助」的政策是成功的，只是由於戰爭的干擾，未能得到顯著的成效，其過非在政策本身。

上述幾位學者對於「民辦公助」的教育成效持肯定的態度，但 Vilma Seeberg 在 *The Rhetoric and Reality of Mass Education in Mao's China* 一書中的看法則較為保留。¹⁸ Seeberg 此書主要是研究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間的中共群眾教育，但在進入正題之前她以一小節的篇幅簡單的介紹了中共根據地的教育。Seeberg 認為「民辦公助」只是將學校教育地方化和非正規化的措施，並未對邊區的教育有所提升。他引用德國學者 Klaus Belde¹⁹的研究指出「民辦公助」下的群眾教育主要對象是中共幹部、勞動英雄和成年的積極分子，實際上仍是精英教育。至於教育內容則是以政治思想為主，識字教育的效果相當差，與過去相比並未有所改善，甚至晉察冀邊區的調查還有退步

所引江隆基這篇報告為〈關於民辦公助政策的初步總結〉，引自《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375-389。

¹⁸Vilma Seeberg, *The Rhetoric and Reality of Mass Education in Mao's China* (N.Y.: E. Mellen Press, 2000), pp. 69-77.

¹⁹Klaus Belde 的著作筆者無法取得，因此只能從 Seeberg 文中一窺其觀點，該書詳細資料如下：

Klaus Belde, *Saomang: Kommunistische Alphabetisierungsarbeit* (Bochum: Brockmeyer, 1982).

的跡象。Seeberg 的結論，或可說是 Belde 的結論，與先前的研究可說是南轅北轍，Seeberg 認為主要原因在於過去的學者受限於材料上的不足，以塞爾頓和 Seybolt 為例，兩人的研究都成文於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所能搜集到的材料有限，而且這些材料多是中共官方政策宣示性質的文件和報告，因此受到了中共官方說詞誤導。

綜觀以上的前人研究可以看出，中共根據地教育發展的研究焦點集中在「正規化」與「民辦公助」之間的政策轉變和差異。從一九三七年開始推動的教育活動歷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數量大幅擴張但品質低落；第二階段的「正規化」試圖提升品質，但結果失敗；第三階段「民辦公助」的推動意在為教育的推展另闢新的途徑。這是學者們對於這一段時期教育發展過程的共同描繪，但是對於「民辦公助」政策的成效、「民辦公助」教育內容等問題則是有不同的看法。

前面提到，大陸學者由於觀點上的限制因此研究結果難以呈現真實面貌。西方學者的研究較為深入，視野也較寬廣，但嚴格來說這些研究只停留在政策轉變過程中的官方思維，對於教育活動實際情況的了解並不夠深入，原因在於材料不足。Seeberg 文中已經對過去學者所使用的材料提出了批評，她認為過去的學者只能根據少量來自於中共官方所發表的公開宣告或是中共重要幹部的報告來了解邊區教育，很容易造成偏差的結論。以 Seybolt 為例，資料來源多半取自《毛澤東選集》、邊區政府主席在參議會中的工作報告、邊區政府出版品及《解放日報》的重要社論，這些材料多數是對外發表的官方說法，宣傳的成分居多，對於理解邊區教育的實際情況幫助實在有限。Seeberg 的這一番批評主要是在看過 Belde 的研究後所得到的感想，她認為 Belde 所用的材料較廣泛，也較能反映真實的情況。由 Seeberg 的引文可知，Belde 的材料主要以邊區政府對下屬各單位所發出的通令、指示為主，這些以邊區幹部為對象的文件比起對外宣傳為主的文章顯然較能反映出事實真相，從中得到的結論也應該較有可信度。

Seeberg 對於塞爾頓和 Seybolt 的批評有其道理，但是她的批評在面對 Pepper 時就無法成立了。Belde 的研究發表於一九八二年，而 Pepper 的研究

成文於一九九六年，Pepper 運用了許多一九八〇年以後陸續公佈的材料，取材顯然要比 Belde 來得新且廣泛，而他對「民辦公助」的評價與塞爾頓和 Seybolt 並無太大的差別，²⁰ 這使得 Belde 的結論又再度受到挑戰。Pepper 所用的材料是目前所有這方研究中取材最為廣泛的，他搜集了許多中共出版的史料彙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老解放區教育資料》。²¹之前介紹《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時曾提到《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一書是中共「七五」國家重點教育科研計畫中徵集各地教育資料後選編出版的資料彙編，也是目前學者所用材料中有關中共革命根據地教育資料最集中、最豐富的一部資料集。在這一套資料中除了有各邊區政府針對不同教育項目的指示、通令、報告和法令規章外，還有許多摘自當時各種報章的報導和社論，透過這些集中的資料顯然對於中共根據地的教育概況會有較完整的理解。除此之外，Pepper 所用的材料中有不少是個人事後對當時教育情形的回憶，²²這是過去學者所缺乏的材料，也一定程度補充了官方視野的不足。

Pepper 所用的材料比起過去的研究無疑是要豐富許多，但是從《老解放區教育資料》這一套資料中看來，這些材料是否完整，是否足夠讓她對於邊區教育能夠作出正確的結論仍是個問題。前面曾提到，《老解放區教育資料》是中共在「七五」國家重點教育科研計畫中徵集了上億字的教育資料後所公開出版的一套資料，然而仔細檢查這部資料後可以發現這一套資料共三輯，不過約一百五十萬字，實際上不到全部徵集資料的 1.5%。據筆者的了解，其

²⁰Selden 在一九九五年重新修訂了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一書，此時的 Selden 理應有更多的材料和研究可供參考，然而新書中對於根據地教育的看法並沒有任何的修改。究竟 Selden 是認為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不足以改變他先前的看法，或是他根本沒有再對這個問題重新檢視，筆者不得而知。見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anan Way Revisited* (N.Y.: M.E. Sharpe, 1995), pp.208-212.

²¹本資料集共分三輯，詳細資料如下：

陳元暉主編，《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一)(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年)。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三)(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6、1991年)。

²²這一部分的回憶資料包括:人民教育社編，《老解放區教育工作經驗片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編，《老解放區教育工作回憶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

它的資料其實已經在各地以不同的根據地為單位分別出版，只是這些資料以內部發行或國內發行的方式出版，外人較不易取得。²³ 可想而知，這批資料數量相當龐大，以其中一部《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²⁴為例，全套資料共有十二冊之多，粗略估計篇幅約在四百萬字左右，而這只不過是陝甘寧邊區一地的材料。相較之下，Pepper 所用的《老解放區教育資料》顯然是篩選後的材料，究竟這些材料的代表性有多少，只有見過那些各地徵集出版的資料後才能正確的判斷。姑且不論這批材料是否能更真實的呈現根據地教育情形，是否能對 Pepper 的研究作進一步的補充或修正，但少了這些材料的支持相信沒人敢對中共根據地的教育驟下定論。

Pepper 材料上的缺陷還可以從其它例子中看得出來。研究回顧中提到 Pepper 對於「民辦公助」的評價主要是根據江隆基在一九四七年的一篇報告而來，在這一篇文章中江隆基提到了「民辦公助」實施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和缺失。Pepper 對於這篇報告「不尋常」的坦白態度顯然相當訝異，她認為這可能是內戰中紛亂的情勢使得官方編輯疏於「看管」，讓這一篇文章得以公開發表因而留存下來。²⁵ Pepper 的推測說明了她使用材料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不加掩飾的材料在她看來是如此的「不尋常」，那麼她的材料究竟有多少的可信度？從中所得的結論是否正確？那些被「看管」而無法公開出版的資料在哪裏？

仔細分析 Pepper 所使用的材料可以發現，她非常缺乏來自地方的第一手

²³各地已出版的根據地教育資料包括有《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匯編》、《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晉察冀邊區教育資料選編》、《晉綏革命根據地教育史資料選編》、《山東老解放區教育資料匯編》、《華中蘇皖邊區教育資料選編》、《鹽阜區教育資料選編》、《浙江革命根據地教育資料匯編》及《東北解放區教育資料選編》等。根據「老解放區教育史編寫工作座談會」的決議，各地除了出版這批資料外，同時也要編出該地的教育大事紀和教育史。見皇甫東玉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紀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年），前言頁1。

²⁴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年）。本套資料分為教育方針、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社會教育和初等教育五個部分，共十二冊。

²⁵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p. 145.

報告。所有學者都認為，適應地方環境是中共根據地教育政策演變的重要因素，「民辦公助」政策的形成正是在考量地方實際狀況後所產生的新方法。但是究竟地方上教育活動的實際情形是如何？所有的學者對於實際教育活動情形的觀察都是透過邊區政府、邊區教育廳或是邊區重要官員的報告，這些高司單位和官員的報告固然是一窺地方情形的可用材料，然而這些報告都是彙整過後的二手資料，如果 Pepper 已經發現這些材料中有過多的掩飾，也許應該從地方的原始報告中來尋找較真實的一面。

由於材料上的缺乏，過去學者的許多看法其實都未經仔細的檢驗。例如過去對於「民辦公助」的評價所根據的多是中共官方所發佈的報告，絕大多數的報告中所見盡是樂觀正面敘述，對於困難和問題則是一語帶過，由這些報告中所得到的正面結論可信度值得懷疑。江隆基的報告透露了一些問題，但是許多事情仍然說得相當含糊：究竟有多少地方要求回歸公辦？地方上如何因應「民辦公助」的推行？「建立教師地位」究竟是什麼意思？該如何「建立教師地位」？江氏言道：只要「建立教師地位」，群眾並不在意增加的經濟負擔。這樣的說法究竟有多少代表性？Pepper 文中大篇幅的引用江氏的說法，但並沒有進一步深入的探討，顯然她並沒有足夠的材料來面對這些問題。又如林邁可認為「民辦公助」以政治教育為重，Seybolt 認為是以生產、衛生等實用知識為主，而 Pepper 的看法則是：雖然中共希望能加入一些政治教育的課程，但如果當地群眾只想學識字、算術也不強迫。三人的看法不同，但卻又各有所據，究竟實際情形如何？再者，學者們對於「正規化」的實施多所批評，並且一致認為是造成一九四二、四三年邊區教育大幅衰退的主因。但如果仔細分析這些看法以後可以發現，學者們對於「正規化」的了解大多來自於一九四四年「民辦公助」逐漸定調後中共本身的回顧和批判，極少由「正規化」實施期間的實際情況來理解。如 Seybolt 所言，「正規化」與「民辦公助」之間的轉變代表中共黨內路線之爭的過程，但這個路線之爭並非只是單純的「意見」之爭，而是夾雜著激烈的權力鬥爭在其中。「整風」以及緊接而來的「審幹」過程中，中共黨內出現一幕幕的激情演出，因亂扣帽子而產生的「冤錯假案」層出不窮，這些是我們已經熟知的事。「民辦公助」為解

決過去教育問題而出現，對過去的檢討和批評本是正常，但是在摻雜了政治鬥爭的因素以後便很難確定這些批評是否客觀。當權派是否爲了確保「民辦公助」的正確地位和合理性因此對於「正規化」過分的貶抑？是否爲了轉移對其它問題的注意而將所有錯誤都歸於「正規化」？過去的研究是否因爲受到誤導過分集中注意在「正規化」的問題上而忽略了其它的問題？

三、 研究途徑與概念界定

基於以上的問題，筆者認爲尋求更多直接的材料才能對中共根據地教育有更多的了解，也才能對過去學者的研究作出較中肯的評論。除了搜集更多的出版資料外，還必需使用原始檔案以補出版材料的不足。由於中共根據地範圍廣大，受限於筆者的能力，本論文將以陝甘寧邊區爲研究對象。陝甘寧邊區自一九三五年底至一九四八年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時間上橫跨了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兩個時期，可說是中共戰時的大本營，也是許多政策的發起點。前面提到，中共這一時期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轉變與實際教育經驗中所遇到的問題有極大關係。政策的發動在陝甘寧邊區，政策形成所根據的經驗也是以陝甘寧地方實際經驗爲主，因此以陝甘寧邊區爲研究焦點應可以更確實的理解中共這一時期教育政策演變的真正原因。此外，從過去學者的研究也可以發現，由於陝甘寧邊區以農村爲主的特殊環境，中共群眾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以農村爲主要考量，而政策的改變也往往是爲了因應在農村所遇到的困難，因此研究農村中實際的教育活動是了解這一時期中共群眾教育最重要途徑。

以延安爲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是中共在「長征」之後的落腳處，中共中央從一九三五年底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在這個地區駐留約有十三年之久，在這期間中共由一群幾乎走投無路的殘兵壯大成爲力足以與國民政府軍逐鹿天下的百萬大軍，陝甘寧邊區在中共革命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中共中央在突破國民政府軍第五次圍剿後，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來到陝

北，隨即在十一月成立了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²⁶開始了政權的運作。一九三七年二月，為緩和「西安事變」後的國共關係，中共以「抗日」和「和平」為號召，宣佈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並改「蘇維埃政府」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²⁷，自此以後以「陝甘寧邊區政府」為名自稱，經過與國民政府一番談判之後，於一九三七年九月正式改制為陝甘寧邊區政府，²⁸名義上是中華民國政府之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經費援助，但實際上自成一國，並不受國民政府的號令約制。

陝甘寧邊區的領域範圍大致在陝西省北部、甘肅東部及寧夏東南一隅，但確切的界限則一直存有爭議。根據國民政府的規定，中共的勢力範圍包括駐防區與募補區不過十五縣，²⁹但中共方面顯然不滿足於這樣的拘束，加上抗戰開始後中共在華北的迅速發展引起中央政府的戒心，雙方自一九三八年底起便不斷有摩擦衝突，因此統治區域並不固定，隨著時局而有所增減。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之間的衝突全面爆發，一九四七年三月面對國民政府的全力進攻，中共放棄延安，中共中央也向北撤離。雖然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共收復延安，但當時中共的勢力已非昔比，不再限於西北一隅，陝甘寧邊區的重要性也已不再，中共中央也早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便已東渡黃河，離開了陝甘寧邊區，一九五〇年一月中共建國之後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宣告結束。

本論文所要探討的「農村教育」是中共在農村中針對一般民眾所推行的教育措施，一般而言，農村中的教育機構有小學和各式各樣的社會教育組織，前者主要以學齡兒童為教育對象，後者以失學的青少年或成人為教育對象。

²⁶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成立西北辦事處的布告〉，《陝甘寧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頁132。

²⁷ 〈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共中央文件選輯》第11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157-158。

²⁸ 雷雲峰編著，《陝甘寧邊區史—抗日戰爭時期(上)》(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3年)，頁12。

²⁹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第二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5年)，頁55。

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可粗分為兩類，一是「幹部教育」，目的在培養黨政軍的領導幹部，教育內容以工作領導和業務教育為特色，對象是再訓練的在職幹部或是預備成為幹部的學生；另一類是針對一般百姓的「群眾教育」，主要目的在提升其統治區內人民基本能力，使人民適應當時邊區的生活環境，並且能配合邊區政府各項政策和動員以因應戰時情勢，或為未來接受更高教育做準備，教育內容包括識字、社會政治常識及自然知識等一般邊區公民所需具備的基本知識。³⁰本論文所要研究的「農村教育」即在「群眾教育」的範疇之內。

邊區幹部教育的學校或訓練班所在地點多在人口較集中的鄉鎮，農村之中的教育活動則是以群眾教育為主。由於陝甘寧邊區以農村為主的人文環境，加上江西蘇區時期的經驗，中共在陝甘寧邊區所規畫的群眾教育措施一開始便是以農村居民為主要考量，其教材、教學組織和形式也針對農村的特殊環境而設計，並且隨著時局的演進陸續有所修正，以因應農村中教育工作所遇到的問題。因此，「農村教育」可說是陝甘寧邊區群眾教育的真正內涵和特色，也只有觀察農村中實際的活動才能正確了解中共在這一時期群眾教育工作的真正意義和其演變的原因。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重點是農村中常態性的教育活動。所謂「常態性」的

³⁰ 在中共的文件中，以「群眾教育」和「幹部教育」兩項來分類根據地教育是一九四四年以後才有的。一九四四年以前的文件中一般將邊區教育分為「幹部教育」、「學校教育」(或稱「普通教育」)和「社會教育」三類，其中「學校教育」是指小學、中學、師範學校等以脫產學生為主的正規學校，「社會教育」則是指以不脫產成人為對象的業餘教育。在這三類教育中，「幹部教育」和「社會教育」的性質和定位較為明顯，前者意在培養工作領導能力，後者意在提升一般平民的基本能力知識，相形之下「學校教育」的定位相當模糊，在某些文件中將「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併稱為「民眾教育」或「國民教育」，似乎認為兩者性質相近，但大部分的文件仍是將兩者分開討論，有明顯的區隔。一九四〇年後中共對「學校教育」中不同項目教育的定位逐漸有了清楚區別，分別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四年將師範學校、普通中學及高級小學明確宣佈為「幹部教育」的一部分，並且在一九四四年以後使用「群眾教育」一詞與「幹部教育」對稱，用以指稱針對一般百姓的教育，項目包括初級小學與社會教育。在外國學者的研究中，Mark Selden 稱這一類教育為 Popular Education，Suzanne Pepper、Peter J. Seybolt 和 Vilma Seeberg 則稱之為 Mass Education，其意義接近中共所使用的「群眾教育」一詞，因此本文中將以「群眾教育」來稱呼這一類教育。

教育活動是指在當地有常設的學校或教育組織，每日或每週安排有固定的教育活動，這些教育活動列入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的年度或學期的固定工作計畫中，是日常巡視檢查及年度總結時工作檢討的重要項目。這些常態性教育活動的對象包含成年男子、婦女及學齡兒童，理論上涵蓋了大部分的農村組成人口；其組織和形式可分為幾類，一是具有正規學制和課程的學校教育，其學生必須脫離生產工作進行學習，如學齡兒童就讀的小學；二是學生不脫離生產、課程較為簡化的半正規學校，如半日校、夜校；三是學習時間和課程均不固定的非正規的教育組織，如讀報組、識字組。

本論文將研究的範圍侷限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之間。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的教育活動不始於一九三七年，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局勢動盪不安，教育活動的進展有限，也缺乏有效的研究材料；陝甘寧邊區雖然在一九五〇年才宣告取消，然而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一九四七年以後陝甘寧邊區已陷入戰火之中，原有正常的教育活動也幾乎停頓，因此研究將以本年為下限。

四、 研究材料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所運用的主要材料有以下幾項：

- 一、《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本資料由陝西師範大學和陝西省社會科學院搜集陝甘寧邊區政府相關檔案編輯而成，內容包括邊區的教育法規，邊區政府、教育廳所發出的指示、通令和報告，各種當時邊區報章雜誌的報導，以及部分地方官員的報告，是目前有關陝甘寧邊區教育最完整的出版資料。
- 二、《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這一部分的檔案由大陸「陝西省檔案館」所典藏，其中最具有價值的部分在於邊區教育廳與地方政府間往來的公文，包括分區公署和縣政府教育官員的呈文、報告，以及教育廳官員的批覆，這是過去研究中所缺乏的一手資料。這一部分的檔案共有七百多卷，由於個人能力和時間上的限制，只能從中擇取部分報告較為完整的縣份做為主要研究對象。

三、法務部調查局「大陸研究資料室」檔案。這一部分的資料相當零散，包括過去中央調查統計局對中共所作的調查報告、戰時搜獲的中共原始文件、中共出版品及教科書。其中較有價值的是為數不少的小學和成人社教組織所使用的教科書，從中可以對於當時的教育內容有大致的理解。

四、陝甘寧邊區所發行的報紙，主要有《紅色中華》、《新中華報》及《解放日報》。邊區報紙中的材料在過去學者的研究中相當常見，但是過去取材通常只限於社論或是官方發表的報告，對於地方上的報導並不重視。筆者在實際查閱這些報紙的過程中發現，報紙中對於地方教育情形的報導相當程度的反映了真實的情形，因此希望透過這些過去較不為學者所重視的報導，搜集更多邊區教育的實際情況。

本論文章節安排，除了緒論和結論二章外，第一章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將探討清末以來的群眾教育發展，說明近代以來「普及教育」觀念在整個教育思潮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普及教育」觀念和技術的演進對中共農村教育政策形成的影響；第二部分則是簡單回顧在陝甘寧邊區之前，中共在湖南、江西等地的農村教育經驗。第二章將說明陝甘寧邊區初期的農村教育措施，包括一九三七年「普及教育突擊運動」所開展的大規模動員宣傳，以及隨後進行以「改善質量」為目標的一連串措施和成果。第三章說明陝甘寧邊區教育在經過一段快速成長的發展之後所遇到的瓶頸，以及與隨後出現的衰退現象；透過較多的原始資料，本章將深入了解陝甘寧邊區教育的實際情形，並且從中理解邊區教育衰退的真正原因。第四章說明中共在初期教育推展受到挫折之後並未因此放棄「普及教育」的理想，從一九四一年的「新文字運動」、一九四二年的推展私學到一九四四年底的「民辦公助」，中共不斷試圖為困難重重的邊區教育尋找出路，本章將對這些措施作一介紹，並且檢討其成效。